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丛书

史前求索集

张宏彦 著

科学出版社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丛书

史前求索集

张宏彦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收录了张宏彦教授多年来从事史前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学术论文等 36 篇。主要内容分为史前环境考古研究,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和中国文明起源探索四个部分。重点对华北及渭水流域史前时期的环境气候演变与古文化的关系,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分期,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分区,渭水流域旧石器时代的遗存的年代和分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分期,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分期,仰韶文化的相关问题等进行了探讨。

本书可供中国史前考古研究者和高等院校考古、文博专业的师生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前求索集 / 张宏彦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8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丛书)

ISBN 978-7-03-048280-8

I. ①史… II. ①张… III. ①史前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K21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2736 号

责任编辑: 樊 鑫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美光设计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7 3/4 插页: 1

字数: 560 000

定价: 1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张宏彦，男，1954年8月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1月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留校任教；1988年获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91~1992年，在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访学。曾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陕西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主持国家级精品课程和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史前考古学”的建设，出版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第二版）和西部人文讲座丛书《中国考古学十八讲》等。曾获西北大学师德标兵、陕西省师德先进个人和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



2003年10月14日摄于奥地利维也纳



2015年1月15日摄于海南岛槟榔谷

本书受陕西省重点学科考古学和西北大学“211工程”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西部地区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
资助出版

前 言

——我的学术历程

2015年2月，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了整整工作33年的考古学教学科研岗位。退休，对大部分高校教师来讲，意味着学术生涯的结束。关于“学术”，古今有不同的定义，近代以来泛指高等教育与研究，或是系统专门的学问。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场所，也是创新知识的地方。因而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没有教学就不能实现大学培养人才的基本功能，而没有科研不断创新知识，就无法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和学科发展的专门人才。因而，我以为大学的“学术”应包含教学与科研两方面的涵义，而这两个方面都需要传承、研究与创新，才能与时俱进。基于这样的理解，对自己的学术历程简要回顾如下，愿与学界诸君共勉、共享。

一、我的学习之路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父亲在大学学的是理科，但国文的基础很好，也喜欢历史。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候是晚上听父亲讲历史故事，对古代的人物和事件充满好奇。但在那个没有电、没有收音机的年代，对国内外的事情知之甚少，因而青少年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或是能干什么。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因是定边县中学校长而被打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子女也受到很大的牵连，常常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感到迷茫。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成了唯一无奈的选择。老老实实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三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中，最大的收获是经受了苦难的磨炼，形成了要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的信念。这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1974年，中国和当时的越南阮文绍政权之间爆发了西沙保卫战，一时全国群情激愤，有关信息也就传到我们这个偏远的陕北长城边上小城——定边。记得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时，前面插映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有关西沙某岛考古发掘的报道，考古人员在岛上发掘出土了一些明清时期瓷片和钱币等物品，证明这些岛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世代生活的地方，是中国的领土。当时我第一次听到了“考古”这个词，并惊奇“考古”还有这等作用。从此，“考古”在我的脑海里划上深深的印迹。

1977年10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使我有通过公平竞争上大学而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虽然我高中时数理化学得很好，但仅有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只好报考文科。可当时全国高校中文科可报考的只有中文、历史、外语、思想政治、图书馆等几个学科门类的专业。我毅然报考了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并幸运地被录取。1978年2月，我背着沉重的行囊踏进了西北大学的校门，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考古生涯。

大学四年学习中，王世和（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戴彤心（夏商考古）、刘士莪（两周考古）、段连勤（战国秦考古）、肖安顺（两汉考古）、贾正中（魏晋南北朝考古）、段浩然（隋唐考古）诸位老师给我们系统地传授了考古学知识；巩启明、韩伟、魏京武、王学理、嵯振西等考古名家给我们做了专题讲座。配合教学，我们先后参观了陕西蓝田公王岭、半坡、秦咸阳宫、沔西遗址、周原遗址和秦公一号大墓，河南的洛阳汉魏故城、郑韩故城、龙门石窟、殷墟遗址，山西的佛光寺、云冈石窟、晋祠等。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使我们获益匪浅，但印象最深的是田野考古发掘实习。1980年10~12月，我们七七级考古班19名同学，在戴彤心等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华县梓里村，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田野考古实习。简陋的住所和工具、日渐寒冷的天气，并没有减弱我们探寻远古奥秘的热情，不断的新发现更是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在戴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学会了绘图、测量和遗迹清理等基本技能，认识了仰韶文化早期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基本特征。梓里，是我迈出的田野考古的第一步，也是我真正认识史前文化的开端。

1982年我留校时，考古教研室确定我担任旧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的主讲。但在大学学习期间，我仅仅了解了一些旧石器考古最一般的知识，连真正的旧石器也没见过几件，古生物、古人类、第四纪地质这些旧石器考古必备的知识更是知之甚少。1982年9月，历史系推荐我到北京大学师从吕遵谔教授学习旧石器考古。在吕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一边听课和观摩旧石器标本，一边编写旧石器时代考古讲义。一个学期的学习，使我对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对中国旧石器有了基本的认识，对承担这门课也有了一些信心。之后在案板遗址发掘中，西北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与第四纪地层学专家薛祥煦教授曾多次到现场考察，我借这些机会请教了他许多有关古生物和第四纪的问题，获得了不少知识。

1983年2~6月，我又有机会参加四川大学举办的“体质人类学进修班”学习，在复旦大学生物系体质人类学教研室邵象清教授主讲和指导下，系统学习了人体骨骼形态观察和测量、男女性别和年龄鉴定，并涉及古人类和人类起源研究等内容。这次学习奠定了我体质人类学和古人类学的知识基础，在以后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教学和相关考古学研究中都有很大的帮助。在此期间，我还有幸聆听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童恩正等先生的讲课，童先生讲课的风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5年，我有幸师从石兴邦和王世和两位先生攻读西北大学史前考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石兴邦先生当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他在繁忙的管

理与研究工作中，仍坚持为我们讲课；石先生高屋建瓴的专业指导，使我获益良多。王世和先生更是为我的专业学习和毕业论文做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我在参加案板遗址发掘和资料整理之余，也在不断思考毕业论文的结构与内容。在两位先生的指导下，1988年，我完成了毕业论文《试论案板遗址仰韶文化遗存的分期》，并顺利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

1991年5月~1992年5月，在王世和先生的联系与推荐下，我有幸到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访学一年。在此期间，我先后参观了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许多考古工地和奈良市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石川县立历史博物馆、九州博物馆等，参加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一年的访学，有两个方面的主要收获：一是参加了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组织的旧石器打制实验培训，使我对旧石器的制作过程有了实际的体验，对旧石器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二是感受到日本考古学界对环境考古的重视，也使我认识到，不了解史前的环境气候变化，我们是很难知道史前文化发生、发展变化的全部原因。有感于此，在访学结束时，我做了《从东亚大陆的石器文化看日本的绳文文化》的演讲，提出细石器和弓箭应是适应草原环境的采集-狩猎文化发明的观点。

以后，利用外出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等机会，向学术界前辈请教，与同仁们交流，我不断获得新的信息和知识。当然，更多的还是通过文献阅读，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不断地思考学术问题。在这个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的时代，我深深地感悟到“学无止境”的真切含意，不学习就跟不上学术的潮流，就会裹足不前。

二、我的教学历程

现代考古学的基础是田野考古，因而大学的考古教学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中田野考古实习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某种程度上讲，田野考古实习的成功与否是考量考古专门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性指标。因为许多考古学的知识，都需要在考古发掘中再认识；一些考古学的理论或观点，需要在田野考古中检验。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考古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也需要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这样才有可能完成各个教学环节，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1982年，我毕业留校任教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王世和先生带领七九级考古班20名同学赴陕西商县紫荆遗址进行为期3个月的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在这次发掘中，除仰韶文化早期和客省庄二期文化外，我第一次见到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的遗存，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发掘结束后，由我整理了全部发掘资料，并在王世和先生的指导下，撰写了第一篇田野考古发掘简报《1982年商县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不仅积累了田野工作的经验，锻炼了组织与协调能力，对我以后的教学科研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1984年起，在王世和先生的指导下，配合八一、八四、八九、九〇级考古班的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和全省地方文物干部田野考古培训，我连续多次参加了扶风县案板遗址的发掘。通过考古现场对遗迹、遗物的仔细观察和对历次发掘出土的大量仰韶文化中晚期、龙山时代早期、西周和汉代的遗存整理，撰写系列发掘简报，编写出版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第一部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案板遗址的发掘，大大丰富了我对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各时期文化特征的认识，提高了田野考古发掘与教学水平。

多年来我还参加或主持过陕西长安北塬汉唐墓葬、唐长安城崇化坊，河南新安县盐东，重庆万州中坝子和上中坝，日本唐招提寺等遗址的发掘。这些田野考古实践，使我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考古资料，而且积累了田野考古发掘经验，为不断提高考古学教学与科研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3年，我获得国家考古发掘领队资格。

从1984年开始，我正式承担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的教学。在当时的课程体系中，这是新生入学后第一门专业课，讲课的效果可能会影响到学生们今后对考古学的兴趣，这对我压力极大。常言道“课上几分钟，课下数年功”。尽管之前有过北京大学“旧石器时代考古”课程和四川大学“体质人类学”的进修经历，为了备课我也查阅了当时能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旧石器考古、古人类学和相关第四纪的论著，写了厚厚几本读书笔记，但缺乏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田野实践与研究，缺乏教学标本，局限于基本考古资料的介绍，没有自己的学术观点或见解，是这门课最大的缺憾。

1992年，通过参加日本榎原考古学研究所的旧石器打制实验培训，我对旧石器的制作过程有了真切的感悟，并将自己亲手打制的石片、石器带回国，作为教学标本。1998年，在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考古发掘实习时，出土了大量的商周时期的打制石器，为使学生们认知打制石器的制作过程，我一方面指导学生仔细观察打制石器的特征，另一方面组织学生亲自动手进行打制石器的实验。通过考古发现与打制实验两种标本的对比，使学生对打制石器有了较好的辨识，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效果。

1999年，我有机会参与整理薛祥煦教授主持发掘的陕西洛南龙牙北洞出土的2000余件石制品。这是一次难得的直接观察与研究旧石器的机会，揣摩、观察一件件石制品，使我对旧石器有了更多感性的认识。之后我们合作写了《陕西洛南龙牙北洞遗址石制品的初步观察与研究》一文。基于这次研究经验和多年的旧石器考古教学实践，我开始思考中国古人类与旧石器的相关问题，先后撰写了《20世纪中国古猿类和古人类研究述评》、《渭水流域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环境与文化区系研究》、《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分期问题》、《泾水上游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与分期研究》、《灞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研究》、《洛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研究》等系列论文。这些论文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但将这些成果融入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内容中，则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1994年开始，我又承担了几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的讲授。基于10年

的教学经验，我开始思考“史前考古学”课程内容的改革问题。传统的考古学课程内容主要侧重于基本考古资料的介绍，缺乏对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和基础知识方面的教学。于是我开始尝试将“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内容和体系统一起来进行“史前考古学”教学改革。根据“史前考古学”研究多学科知识交叉的特点，将教学的基本内容确定为：史前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史前环境（环境考古）、史前人类（体质人类学）和史前文化四大块，每部分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既注重基础性和全面性，又突出知识性和学术性。这样的内容纲目清晰，知识系统，效果明显。基于多年史前考古的教学实践与思考，2003年，编写出版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第一部教材——《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005年，《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获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6年，入选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经过几年的修订和补充，201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第二版）。经过多年的建设，2004年“史前考古学”入选陕西省精品课程，2006年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2013年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994年，考古专业的课程体系做了较大的调整，新开设了专业基础课“中国考古学通论”。我承担了“中国考古学通论（上）”的讲授，内容从旧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一方面，我过去对夏商周时期考古关注不多，需要学习；另一方面，如何调整“中国考古学通论”与“史前考古”和“夏商周考古”的教学内容而使之前后衔接，这也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我把“中国考古学通论”的内容定位为讲述基本理论与方法、基本的时空框架和各类遗物的基本知识方面，而“史前考古”等各时代考古课程则侧重于专题和相关研究动态、成果的介绍。这样的课程体系和内容，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明显提升了教学质量。2008年，在多年的“中国考古学通论”教学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西部人文讲座”丛书《中国考古学十八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该书被许多学校作为教材或辅助教材使用。

从1995年开始，我协助石兴邦、巩启明、王世和三位先生培养史前考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从诸位先生的言传身教中获得了许多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经验。1998年获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2003年获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多年来，通过“史前考古文献导读”，引导学生认识史前考古的历史、现状和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环境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课程，努力拓宽学生的专业基础，开阔学术视野。在上述理论课的基础上，我用更多的时间引导学生多参加田野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参与发掘简报或报告的撰写，在实践中寻找研究课题，完成毕业论文。通过这样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考古学人才培养路径，共培养博、硕士研究生30名。他们或已成为各地考古学研究机构或高校的学术骨干，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业绩；或成为考古队伍的生力军，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30多年的教学历程，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西北大学和考古专业的教育改革过程。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无论如何改革，无论要建设什么类型的学校

(教学科研型、研究型等), 人才培养都是大学最基本的功能, 这也是大学教师最基本的职责。注重学术、善待学生, 敬畏课堂, 是我多年教学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念。而人才培养的些许成就, 是我教学历程中最感欣慰的。

多年辛勤的教学耕耘, 使我获得一些教学成果——2005年获西北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一等奖, 2009年获西北大学师德标兵荣誉称号, 2010年获陕西省高等学校师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4年获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荣誉称号。

三、我的科研生涯

我生长在黄土高原, 对这片土地有着与生俱来深厚感情。我的田野考古工作也主要是针对黄土地区的史前遗存, 这决定了我研究的主要时空范围是以渭水流域为中心的黄土地区的史前文化。或许有人以为, 这个研究时空范围太小, 最多成就的不过是一个区域考古学家。但我以为, 一方面, 中国的史前文化过于庞大, 各地文化千差万别, 不是每位考古学家都能亲力亲为而准确把握的; 另一方面, 如果不能仔细研究中国诸多的区域文化, 也就无从宏观地了解中国的史前文化。换言之, 没有诸多区域文化的研究, 也就谈不上对中国史前文化整体的研究。

我的史前考古研究生涯, 始于华县梓里遗址的发掘, 尽管是本科阶段的田野考古实习, 但却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史前文化的具体内涵。1982年商县紫荆遗址的发掘, 写出了第一篇考古发掘简报——《1982年商县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这是我考古学研究的开端。之后的案板遗址连续多年的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系列发掘简报及《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的编写, 使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也锻炼了观察、分析和研究的能力。这是我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

这本集子收录的三篇发掘简报, 是我参与田野考古的一个缩影。但按一般的惯例, 发掘简报是不能编入论文集的; 更有甚者认为发掘简报、报告之类, 不过是资料性的东西, 不能算科研成果。但我以为, 从田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到编写发掘报告, 是一个连续的研究过程; 考古简报或报告, 不仅仅是发掘资料的报道, 其中也有发掘者的分析、认识乃至学术观点, 也应是基础性学术成果之一。谁能说梁思永先生的《后冈发掘小记》没有学术意义。诚然, 一位考古学者的学术生涯中, 不能仅写发掘简报或报告, 但也不能没有考古发掘经历, 否则是不可想象的。

在上述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 我的学术生涯中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1988年, 基于案板遗址仰韶文化遗存的发掘和研究, 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试论案板遗址仰韶文化遗存的分期》, 1991年发表了《“色葬”与绘身——仰韶文化民俗一瞥》。之后, 我在仰韶文化的研究方面,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仰韶文化时空范围的界定问题。这是仰韶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 也是颇有争议的关键性问题之一。自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而发现了仰韶文化以来, 仰韶

文化的时空范围愈划愈大，成为一个西至甘青、东界豫东、南达汉水流域、北到长城沿线的庞大体系。然而随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学术界也开始重新认识分布于不同区域的仰韶时期遗存的异同和文化属性。为此我撰写的《关于仰韶文化时空范围的界定问题》一文中认为：首先，过去由于时代或资料的局限，学者们在遗址间、区域间文化遗存的比较研究中，往往习惯于依据几种甚至一种文化因素做定性分析，缺乏定量分析，而这种定性比较研究的结果就是不断扩大仰韶文化的时空分布范围。其次，由于历史的原因，仰韶文化最初发现于豫西的渑池县仰韶村并得以命名，以后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及庙底沟类型的建立，更使许多学者相信豫西是仰韶文化的中心所在。而实际上豫西地区处于仰韶文化的边缘地带，其文化内涵无疑含有相邻其他文化的因素，以这样的遗址作为典型遗址进行比较，无疑会不断扩大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最后，依据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典型遗址的特征，将仰韶文化的时空范围界定为：在距今 7000~5000 年间，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包括甘肃的天水地区和泾水上游、陕西洛河中上游和汉水上游、晋西南地区、豫西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二是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这也是仰韶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过去学术界虽然多认为老官台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源头，但也感到二者之间有缺环。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找到老官台文化最晚的遗存和仰韶文化最早的遗存，才能看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我撰写了《渭水流域老官台文化分期与类型研究》、《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分期问题》和《仰韶文化最早遗存的再探索》系列论文。提出以北首岭 77T2 ⑥层下墓葬出土陶器是老官台文化最晚的遗存，以北首岭 77T2 ⑤B 层下墓葬及随葬陶器为代表的遗存早于仰韶文化半坡期，是仰韶文化最早的遗存，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依据上述研究，仰韶文化可分为初期（北首岭期）、早期（半坡期）、中期（庙底沟期）、晚期（西王村期）四主要的发展阶段。

三是仰韶文化半坡与庙底沟类遗存的关系问题。这是考古学界长期争议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我在教学科研中常感困惑的问题。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部分学者提出半坡与庙底沟是平行发展的两支文化，庙底沟类文化的源头在晋西南观点，传统的仰韶文化面临着解体的局面。然而仔细梳理以前的学术争论，发现过去的研究多将典型的半坡类遗存同典型的庙底类遗存比较，缺乏中间的环节；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半坡类较晚阶段的遗存同庙底沟类较早阶段的遗存，这才有可能看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掘案板遗址时，我们就发现庙底类较早阶段的遗存中有原始重唇口尖底瓶和绘有流星状纹样的窄沿圜底盆，显示出既有半坡类型陶器的某些因素，又初具庙底沟类型的特征。如果把北首岭遗址的图案化鱼纹、华阴南城子的简化鱼纹与案板的流星状纹排列在一起，就可发现，所谓流星状纹，很可能是由图案化鱼纹逐步演而来的一种写意性鱼纹。从而得出关中地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应是仰韶文化先后发展的两期，它们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观点（见《试论案板遗址仰韶文化遗存的分期》）。仔细梳理大地湾二期和原子头仰韶二、三期的“史家类型”的遗存，可以看出不

仅有大量图案化鱼纹、还有直线纹、斜线纹、圆点纹、圆圈纹、弧边三角纹、半月纹、菱形纹、叶形纹构成的图案，图案化鱼纹与所谓的花卉类纹样共存，构成“史家类型”彩陶的鲜明特点。王仁湘先生通过鱼纹的研究后认为，“庙底沟文化”广泛流行的叶片纹、花瓣纹、菱形纹、带点圆圈纹等，大都是鱼纹拆解后重组而成的。这项研究给我很大的启示，在广泛收集仰韶文化鱼纹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从仰韶文化鱼纹的时空演变看庙底沟类彩陶的来源》一文，认为从仰韶文化写实性鱼纹到的图案化鱼纹、再到构图元素拆解与重组的演变过程看，庙底沟类彩陶花纹的构图元素，主要来自图案化鱼纹。渭水流域半坡类遗存和庙底沟类遗存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文化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稍后又撰写了《再论“史家类遗存”》一文，对“史家类遗存”的时空分布及其源流再做探讨。依据变体鱼纹的空间分布的指示，揭示出仰韶文化“史家类遗存”主要分布于渭水流域的陕西关中和甘肃天水一带；从彩陶纹样与主要陶器演变等方面看，渭水流域“史家类遗存”既是仰韶文化半坡期的继续与发展，也是联结半坡与庙底沟期的过渡环节，又是庙底沟期文化的主要来源。

除了仰韶文化研究之外，基于长期“旧石器时代考古”教学过程中学习和积累的有关第四纪、古生物等方面的知识，环境考古也成为我经常关注和研究内容之一。1995年以来，先后发表了《试论史前考古与古环境研究的关系》、《渭水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古环境与古文化》、《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环境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纲要）》、《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变化过程的环境考古学观察》、《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环境考古学观察》、《河套地区“前长城地带”形成的环境考古学观察》等系列论文，并将这些成果融入了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中。在环境考古研究过程中使我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学科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也越来越强。就考古学研究而言，应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技术也越来越多。一位考古工作者，如果不懂得相关学科的知识 and 语言，不会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研究考古学的问题，那就很难从事现代考古研究。

文明起源也是我近几年来思考的问题之一，主要做了两面的研究工作：一是有关传说时代的研究，二是关于文明起源有关问题的探索。在过去的教学科研中，囿于考古学界不轻易涉足传说时代的传统，对这些问题一直未做深入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我逐渐认识到，一方面，传说时代并非完全是子虚乌有的神话，应有其合理的“史影”，我们不应回避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一部上古史或曰史前史，不应仅仅是盆盆罐罐的排列史，而应是有人、有事生动的人类活动史。但如何寻找传说时代的“史影”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2007年以来，我撰写了几篇小文，试图对传说时代和文明起源理论问题做些探索。在《陕北史前文化与“黄帝文化”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认为传说的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几乎都可在龙山时代的遗存中找到。因此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应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在《黄帝陵与“黄帝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一文中，认为陕北有着从史前到夏商时期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神木石峁、新华和延安芦山峁遗址发现大量精美的玉器，反映出文化发展水平并不低于周边其他地区；依据“禹兴于西羌”的历史记载，夏文化的发祥地有可能在西北地区。在《20世纪炎黄文化研究的考古学回顾与思考》一文，在回顾20世纪“炎黄文化”的研究史的基础上，认为过去的探索中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或探索的问题，文明起源和“炎黄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远。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和《由“酋邦”到“古国”——关于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模式述评》两篇论文中，明确了“文明”、“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等概念，对国内外有关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模式进行了梳理，认为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实际，合理地借鉴国外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完善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模式，特别是加强个案研究，仍是今后的一项长期任务。本来还想写写《“禹兴于西羌”的考古学观察》或是《中国文明起源的西部因素》之类的论文，但由于年龄、精力和条件等方面限制，已是很难完成了。

回顾30多年的学术历程，颇感平淡，既无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无引领学术潮流的影响。若用现今以项目、期刊等级和数量作为主要指标进行学术评价的话，实属一般。但致力于教学改革，努力培养合格考古人才，探索史前文化奥秘，是我学术生涯孜孜的追求。在人才培养和科学探索的漫漫长路上，如果能做出一点贡献，哪怕是一纳米的贡献，我也就知足了。即使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成就，也离不开西北大学及主管部门教务处、科研处、社科处各级领导的关心，离不开我供职过的历史系、文博学院、文化遗产学院历届领导和考古专业诸多同事乃至学生们的支持，也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在我的学习、学术历程中，西北大学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我热爱西北大学，热爱考古专业。因此，愿将这本小集子献给西北大学，献给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献给即将迎来成立60周年的考古专业。

张宏彦

2016年4月写于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寓所

目 录

田野考古篇

- 陕西华县梓里遗址发掘纪要····· (3)
- 1982年商县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6)
- 案板遗址仰韶时期大型房址的发掘——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第六次发掘纪要····· (35)

环境考古篇

- 试论史前考古与古环境研究的关系····· (45)
- 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纲要)····· (50)
- 渭水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古环境与古文化····· (59)
- 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环境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 (67)
- 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变化过程的环境考古学观察····· (79)
- 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环境考古学观察····· (87)
- 河套地区“前长城地带”形成的环境考古学观察····· (94)

旧石器时代考古篇

- 20世纪中国古猿类和古人类研究述评····· (111)
- 渭水流域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 (122)
-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分期问题····· (135)
- 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环境与文化区系研究····· (142)
- 陕西洛南龙牙北洞遗址石制品的初步观察与研究····· (153)
- 灞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研究····· (163)

洛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研究····· (177)
泾水上游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与分期研究····· (187)

新石器时代考古篇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分期问题····· (205)
东亚地区史前石镞的初步研究····· (213)
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与起源研究····· (235)
渭水流域老官台文化分期与类型研究····· (244)
“色葬”与绘身——仰韶文化民俗一瞥····· (272)
试论案板遗址仰韶文化遗存的分期····· (276)
关于仰韶文化时空范围的界定问题····· (289)
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分期问题····· (296)
仰韶文化最早遗存的再探索····· (306)
从仰韶文化鱼纹的时空演变看庙底沟类彩陶的来源····· (318)
再论“史家类遗存”····· (329)
仰韶文化居民体质特征与人口研究····· (354)
渭泾水流域龙山时代早期诸文化的比较研究····· (366)

文明探源篇

陕北史前文化与“黄帝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379)
黄帝陵与“黄帝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385)
20 世纪炎黄文化研究的考古学回顾与思考····· (393)
由“酋邦”到“古国”——关于 20 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模式述评····· (401)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 (408)

Abstract····· (418)

后记····· (422)